

\mathcal{E}_k , \mathcal{E}_k'

\mathcal{E}_k , \mathcal{E}_k'

第一章 代序：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① 生平事迹若干片断

一

我们这座城市平平常常，一向没有引人注意的地方，不久前却发生了几起很奇特的事情。由于我笔钝才拙，在叙述这些事情之前，不得不从远一点儿说起，先讲讲才智出众、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事迹的若干片断。这些事迹只能作为这部记事录的序言，而我打算描述的故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是19世纪40年代俄国“纯正的自由派”的典型。这个人物的主要原型是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莫斯科西欧派、自由主义者的领袖人物季·尼·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他于1839年起任莫斯科大学教授，是专制和农奴制度的反对者，在俄国文化发展和年轻一代人中起过重大影响。此外，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还带有别林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身影。

事本身，留待下文再说。

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我们中间经常扮演一种特殊的、可以说是爱国爱民的志士仁人的角色，而且他喜爱这个角色，嗜之成癖，——甚至使我觉得非此他就活不下去。这不是说，我把他比作舞台上的演员，不，我绝无此意，何况我本人十分尊敬他。这里可能是习惯问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一贯的高尚爱好，从童年开始就沉浸在愉快的梦想之中，希望能具有志士仁人的美好风范。比如说，他十分喜爱他那“受迫害者”、也可以说“被流放者”的地位。这两个小小的字眼有一种古典的光彩，彻底把他给迷住了，以后这在他自己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经年累月，最后俨然觉得自己高踞在碑座之上，扬扬得意。在上世纪的一部英国讽刺小说^①里，有一个叫格列佛的人从小人国回来。小人国里的人身高不及六英寸，身居他们中间，他习惯于把自己看做巨人，所以走在伦敦街头，他情不自禁地向过往的行人和车马大声叱呵，要他们在面前闪避，当心他在无意之间把他们踩得粉身碎骨，因为他仍把他自己看成巨人，而他们是小人。人们为此而嘲笑他，责骂他，一些粗鲁的车夫甚至用鞭子抽打这位巨人。但是这样做公正吗？由于习惯使然，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习惯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几乎也做出这样的事来，不过更为天真而且无害罢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① 指英国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的小说《格列佛游记》（1724）。

我甚至认为，他最终到处都被人遗忘了；不过绝不能说，从前完全没有人知道他。毫无疑问，他一度曾跻身于我们上一代的某些著名人士之列，是璀璨群星中的一颗星星，有一段时间（不过只是极其短暂的一刹那），许多人仓促地把他的名字几乎同恰达也夫^①、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和当时刚在国外崭露头角的赫尔岑的名字相提并论。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活动几乎在他开始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其原因可以说由于“局势的风云突变”。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发现，不仅没有什么“突变”，连“风云”也没有出现过，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是如此。我现在，在几天之前才知道一件事，使我十分惊讶，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原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到我们省里来住在我们中间，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所想的那样是流放来的，他甚至从来没有受到过监视。你瞧，一个人的想象力可能达到什么程度！他本人一辈子都真诚地相信，在某些范围内人们一直提防着他，他的一举一动不断受到注意和监视，在我省最近二十年内更迭的三任省长，上任之时对他都抱着一种特殊的深感麻烦的想法，这种思想是上级、主要是前任省长在交接时提示的。假如当时有人以确凿的证据向最正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明他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他一定会感到委屈。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一位十分聪明、十分有才华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学者，虽然在学术上……唉，怎么说呢？总

① 彼·雅·恰达也夫（1794—1856），俄国哲学家，曾参加1812年的卫国战争，1821年加入十二月党人的团体北社。他的著作《哲学书简》对俄国历史持批判态度，包括它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主张吸收西欧文明、天主教和西欧文化传统。但他的观点比较复杂，常有自相矛盾之处。

之，在学术上他的成就并不大，似乎是一事无成。^① 不过我们俄国的学者，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他从国外回来后，曾在一所大学的讲坛上授课，显露过他的才华，那已是 40 年代末的事了。他一共只讲了几次课，似乎是讲阿拉伯人的^②；还对他那篇精彩的学位论文进行了答辩；这篇论文论述 1413 年和 1428 年之间德意志小城哈瑙一度可能具有城市和汉萨同盟^③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终于没有实现的种种特殊的莫名的原因。这篇论文巧妙地刺痛了当时的斯拉

① 莫斯科大学东方学保守的教授 B.B. 格里戈里耶夫（1816—1881）曾对格拉诺夫斯基作过类似的评价。这种意见引起同时代人的愤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格拉诺夫斯基的著作》（1856）一文中说，格拉诺夫斯基“就其禀赋和学识来说，堪为伟大的学者”，“是祖国真正的儿子、为祖国的需要而不是为自己工作”。——俄编注

* 《群魔》是一部内容十分复杂的小说。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思想潮流，不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时所依据的人和事，不了解他讥诮、挖苦、隐判、影射、挞伐的对象，是很难理解这部作品的。因此，除了对这部小说整体上的构思和创作过程、思想内容、发表后俄国内外的反应及其影响应作详尽的阐释外，还应对小说本文作大量注释。限于篇幅，译者只能择要而加，以帮助读者理解和思考。

② 格拉诺夫斯基在讲课中没有谈阿拉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说，很可能是为了讥讽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的讲课。

③ 汉萨同盟是中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和政治同盟，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哈瑙是德国美因河畔一座古老的城市。格拉诺夫斯基 1845 年在莫斯科大学答辩的学位论文《沃林、约姆斯堡和维涅塔》讲的就是中世纪几个德国城市的历史。许多人认为，论文的结尾部分隐刺俄国斯拉夫派美化斯拉夫民族历史的各种倾向。因此论文遭到斯拉夫主义者莫斯科大学教授舍维廖夫和博江斯基的抨击，对此格拉诺夫斯基写道：“人们在论文里读出我没有想过要写的东西，我以前的所有敌人都对我群起而攻之。”——俄编注

夫派^①，使他在斯拉夫派中间一下子树立了许多势不两立的仇敌。后来——不过那是在他失去教席之后——他（可能是为了报复并指出他们失去的是何等样人）在一本登载狄更斯作品译文并宣扬乔治·桑思想的进步月刊^②上发表了一篇极为深刻的研究文章的开头部分，文章讲的好像是某一时代某些骑士具有非凡高尚的道德品质的原因，或者诸如此类的内容。^③至少包含的是一种令人景仰的、非凡高尚的思想。后来有人说，这篇文章的续篇骤然遭到禁止，甚至那本进步杂志也因为发表了它的前半部分而遭了殃。这很可能，因为在那个时代什么样的怪事没有发生过？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更有可能的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而是因为作者自己懒得把它完成罢了。至于他中止讲授关于阿拉伯人的课程，那是因为有一次有人（显然是他的反动敌人）截获了他写给某人的一封信，信中讲到一些“情况”，因此有人要求他作出某种说明。^④我不知道，事情是否果

① 斯拉夫派是19世纪中叶俄国的一个社会思想派别，与西欧派相对立，主张俄国由于自己的独特情况（宗法制度、守旧思想、东正教）应该走与西欧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斯拉夫派代表贵族阶级利益，反对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反对政治上的改革，反对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固然，他们中也有人批评农奴制，以及当时官吏腐败、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等现象。

② 指《祖国纪事》、19世纪40年代该杂志发表了多部狄更斯和乔治·桑作品的俄译文。

③ 讽刺性地暗指格拉诺夫斯基一篇关于法国中世纪骑士的文章，叫做《骑士巴亚尔》，登载在《教育丛刊》上。后来俄国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亚·瓦·尼基坚科（1804—1877）因此戏称格拉诺夫斯基基本为“思想界的巴亚尔、大勇大义的骑士”。——俄编注

④ 在1846年2月4日的一封信中，格拉诺夫斯基曾写道：“去年我被人告密三次，说我是‘一个对国家和宗教有害的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查获的材料表明，（转下页）

真如此，但是人们还说，就在那个时候在彼得堡查获了一个庞大的违反人性、反对政府的团体^①，大约有十三人之多，几乎震撼了整个大厦。据说，他们好像准备翻译傅立叶本人的作品。正好在这个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一首长诗^②，鬼使神差地在莫斯科被搜获，这首诗还是六年以前，当他还是年少气盛的时候在柏林写的，它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两个诗歌爱好者和一个大学生之间流传。我的抽屉里现在也放着这首长诗，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去年才赠送给我的，诗由他本人于不久前亲手抄写，上面有他的题词，用极讲究的红色山羊皮作封面。不过，诗写得不无诗意，甚至可以说不无才气；它很古怪，但是当时（说得确切点，就是在 30 年代），这类诗常常是这样写的。要叙述它的情节，我感到为难，因为说实话，它

（接上页）格拉诺夫斯基对大学生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当局把他看做“不可靠分子”而加以秘密监视。同时有人控告他在历史课上从来不提左右历史事件和各民族命运的上帝的意志和作用，因此莫斯科都主教菲拉列特要他对此作出解释。

- ① 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1846—1849），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小组的政治纲领明言要动摇农奴制国家的基础。在 1848 年的一次集会上有人曾提出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的著作译成俄文。
-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讽刺描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这首长诗，利用俄国诗人、思想家弗·谢·佩切林（1807—1885）一首长诗中的形式和部分情节作为素材。佩切林的长诗是三部曲，其中一部题为《死神的胜利》（1834），诗中有许多合唱：风的合唱，火炬的合唱，星辰的合唱等。有一个场景中死神以《新约全书·启示录》中骑白马者的形象出现，苍天、大地和各族人民都伴随着死神，唱着赞颂的歌。佩切林在 30 年代是莫斯科大学的教师，思想进步，其同时代人认为，这首诗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爱好自由的青年的沉重心情。此诗被收入《北极星》（1861），后转载于尼·普·奥加辽夫主编的文集《19 世纪俄国秘密文学》（1862）。——俄编注

的内容我一点儿也不懂。它有点儿像寓言，采取抒情剧的形式，使人想起《浮士德》的第二部。场景以女声合唱开始，然后是男声合唱，然后是一些精灵的合唱，最后是幽魂的合唱。这些幽魂还没有经历过人世，但十分想经历一番。所有这些合唱的内容十分含混不清，大部分是有关一个什么人的诅咒，但具有极深刻的幽默色彩。然而场景突然变化，“生之节日”到来，在这个节日里甚至连昆虫也尽情欢唱，一只乌龟也上场念了一段拉丁文的圣礼颂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连一种矿石，就是说，没有灵性的天生物，也唱了一支什么歌。总之，大家不住地唱，如果说起话来，那就是含混不清的对骂，不过也具有含义极深的色彩。最后，场景又变换了，出现了一片荒野。在巉崖峭壁之间一个文明的年轻人在徘徊，他采撷野草，吮吸着。仙女问他：干吗吮吸这些野草？他回答说，因为他感到体内生命力过剩，需要昏睡，发现这些野草的液汁能使他昏昏睡去；但是他的主要愿望是尽早失去理智（这个愿望也许是多余的）。然后突然出来一个俊美无比的少年，他骑着一匹黑色骏马，后面跟着一大群各个民族的人。少年代表死亡，各民族的人则渴求死亡。最后，在结束的那一场里，忽然出现了巴别塔^①，许多大力士唱着新希望之歌终于快把它建成了。当他们快建成塔顶的时候，主人，就说他是奥林匹斯山^②的主人吧，滑稽可笑地狼狈逃跑了，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取代了他的地位，立即以对事物的新认识开始了新生活。请看，就是这样一首长诗当时被看做洪水猛兽。去年，我建议斯捷潘·特

^① 典出《旧约全书·创世纪》，第11章。挪亚之子孙拟建一座通天高塔，名巴别塔，上帝使建造者语言混乱，塔未建成。

^② 希腊神话中诸神聚居的地方。

罗菲莫维奇把它刊印出来，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它已是完全无害的了，但是他拒不采纳，显然对我很不满意。他不喜欢完全无害的看法，我甚至认为，在以后的整整两个月内，他对我的态度有点儿冷淡，原因就在这里。后来怎样呢？突然，就当建议他在这里发表的时候，——我们的长诗却在那里，也就是在国外出版了，收在一本革命文集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事先一无所知。他起初很害怕，赶忙去谒见省长，并写过一份极其光明正大的申辩书给彼得堡，他把申辩书念给我听，念了两遍，却没有发出，因为他不知道该寄给谁。总之，他激动了整整一个月，但是我相信，他在心灵深处感到无比荣耀。有人设法给他搞来一本文集，他几乎抱着文集睡觉，白天则把它藏在枕头底下，甚至不让女佣整理床铺。而且虽然他每天都等待有什么电报来，但却仍神气昂然。什么电报都没有来。这时他才同我言归于好，这证明他那温和的不念旧恶的心灵是多么善良。

二

我绝不是说，他一点儿都没有受到伤害；只不过现在我充分相信，当时只要他作一些必要的解释，就完全可以继续讲授关于阿拉伯人的课程，一直教下去。但是他那时过于自负，作出了非常匆忙的安排，断然使自己相信，由于“风云突变”，他的事业这辈子已经破灭。但是说穿了，他的事业的转变却另有真正的原因，那就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先后两次殷切邀请他去教育她的独生儿子并促使他在智力上充分发展。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一位中将的夫人，大富豪，她

把他作为最尊敬的导师和朋友邀请他，更不用说优渥的待遇了。她第一次邀请他还是在柏林，当他第一次断弦的时候。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我们省里的一位轻佻女子，他同她结婚时年岁尚轻，鲁莽轻率，与这位楚楚动人的尤物相处，似乎经受了许多痛苦，因为他资财不足，无法供养她，此外还有一些别的颇为微妙的原因。她在巴黎过世，最后的三年他们就已分居；她给他留下一个五岁的儿子——“最初的、欢乐的、尚无忧虑的爱情的结晶”，有一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忧伤之中突然脱口说道，那时我就在他身边。孩子从一开始就被送往俄国。一直由几位住在穷乡僻壤的远房姨妈抚养。那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谢绝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聘请，很快就续弦再娶，同一位居住柏林的沉默寡言的德国女人结了婚。距第一个妻子去世还不到一年，而主要是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需要这样做。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那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使他谢绝了家庭教师的职位；当时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正煊赫一时^①，声誉正隆，使得本来就准备当教授的他也动了心，于是他也飞向讲坛，以便试一试他那双雄鹰的翅膀。但现在他的翅膀已遭火燎，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从前就曾使他的决心动摇过的邀请。此时，和他相处不到一年的第二位夫人也猝然谢世，使一切最终决定了下来。我要坦直地说：决定一切的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他的热情关切和宝贵的可说是古典的友谊（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友谊的话）。他投入了这一友谊的怀抱，这种关系固定下来，一直延续了二十余年。我使用了“投

^① 当时保守的莫斯科大学教授 B.B. 格里戈里耶夫曾认为，彼得堡大学最负盛名的教授是奥·伊·先科夫斯基（1800—1858，讲授阿拉伯和土耳其语言文学），但这里所谓“令人难忘的教授”多半是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原型格拉诺夫斯基。

入了怀抱”这样的词语，但千万可别想入非非；怀抱只应该从最高尚的意义上来理解。一种最细腻最微妙的关系把两位如此卓越的人物永远联系起来了。

家庭教师的职位之所以被接受，还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第一位夫人留下的小庄园——非常之小——正好同斯塔夫罗金全家在我们省城近郊的一座宏大庄园斯克沃列什尼基相毗邻。此外，还可以经常在幽静的书斋中献身于学术研究，以最深邃的研究成果丰富祖国的语文科学，而不用为大学的繁重课业分心。后来，研究成果并没有出现；但却使另一件事情成为可能，那就是以他一生的余年，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可说是“谴责的化身”，站在祖国的面前，正如人民诗人^① 所说的：

你是谴责的化身

.....

站在祖国的面前，
理想主义的自由派呀。^②

但是，人民诗人笔下的人物，只要他愿意，也许有权利一生都摆出这种姿态，虽然这未免有点儿无聊。可是我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与这些人物相比，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仿效者，而且他已经站累了，往往懒洋洋地侧身躺下来休息。不过，平心而论，即使他无所事事，侧身而卧，他仍然是“谴责

^① 指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他在生前就被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人民诗人”，下面几行诗引自他的诗作《猎熊猫》（1866）。

^② 尼·尼·斯特拉霍夫与赫尔岑都谈到“纯正西方派”格拉诺夫斯基同涅克拉索夫的长诗《猎熊猫》和《萨沙》的主人公相近似。

的化身”,^① 何况对外省来说, 这也已绰绰有余了。你只要看看他在我俱乐部里坐下来打牌时的情景就知道了。他的全身似乎都在说: “玩牌! 我坐下来跟你们玩叶拉拉什^② 牌戏! 难道这相称吗? 谁应对此负责? 谁使我的事业归于毁灭而变成一场叶拉拉什? 唉, 让俄国完蛋吧!”——于是他气派十足地打出一张红桃五牌。

实际上他十分喜爱打纸牌, 为此, 特别是在最近, 他常常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发生不愉快的口角, 尤其因为他经常输钱。^③ 不过此事留待以后再说。我只想指出, 他甚至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就是说有时候), 因此常常独自忧伤。在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友好相处的二十年当中, 他每年总有两三次陷入我们称之为“爱国忧思”^④ 的心绪之中, 说得简单点, 就是陷入忧郁的心情之中, 但是深受尊敬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喜欢这个词语。后来, 除了爱国忧思之外, 他又沉浸在香槟酒中, 但是体贴入微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一生都守护着他, 使他不沾染上庸俗的习气。而他也需要有一个保姆照顾, 因为他有时候变得十分奇怪: 在最崇高的忧思之中他会突然纵声大

^① 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中有这么一段话: “注意点, 别让人这样对你说: ‘喂, 糟老头! 你一生都侧身而卧, 无所事事, 如今却来指责别人, 问别人为什么要那样生活。’”这里当是用来讽刺斯捷潘。

^② 叶拉拉什 (*ялалаш*) 是旧时的一种纸牌戏, 这个俄文词的另一意义是“乱七八糟”。

^③ 格拉诺夫斯基的同時代人说他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里, “因自由主义而受当时政府的怀疑, 随时等待惩罚”, 他“为了消愁而赌博成瘾; 但是赌博使他家业衰落, 债台高筑, 不仅不能消愁, 反而使他增加了道德上痛苦的屈辱感, 更为忧郁”。

^④ “爱国忧思”是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报刊上常常提到的一个词语, 说明知识分子深感农奴制专制制度的重压而又意识到自己无力加以改变的那种心绪。

笑，其姿态完全像一个平民百姓。有时候甚至会以幽默的口吻谈论他自己。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最害怕的莫过于幽默。这是一位古典派女人，学术和文艺的女庇护人，完全以高尚的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行动。这位高尚的女人二十年来对他可怜的朋友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关于她应作专门的叙述，现在我就来谈谈。

三

世上有些人之间的友谊是很奇怪的：朋友俩彼此都恨不得把对方吃掉，一辈子都过着这样的日子，但却不能分离。甚至绝对不可以分离：一旦真的闹翻的话，那位挑起争端、与另一位断绝交往的朋友，自己首先会郁悒成疾，甚至因此死去。我确实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几次，有时甚至是在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面对面地、推心置腹地互诉衷情之后，当她一走，他突然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攥紧两个拳头，一个劲地猛击墙壁。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没有一点儿虚构的成分，有一次甚至把墙上的灰泥都敲了下来。也许有人会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微妙的细节的？但是，要是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呢？要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止一次地伏在我的肩头上号啕大哭，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全部内情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什么话不说！）然而在号啕大哭之后，几乎总是发生这样的事：第二天他已经因为自己的忘恩负义而准备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急急忙忙地把我叫到他那里去，或者亲自跑到我这里来，其唯一的目的告诉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贞洁与温和的天使，而

他自己正好是她的反面”。他不仅跑到我这里来，而且不止一次地在写给她本人的洋洋洒洒的长信中描述这一切，并且签上全名，向她坦白自己的卑劣行径。比如说，就在昨天他告诉一个不相干的人，说她聘请他是出于虚荣，她妒忌他的学问和才能；她憎恨他又害怕明显地流露出她的憎恨，唯恐他离她而去，从而有损她在文学界的名声；因此他鄙视自己，决心自戕而死，只等她最后一句话决定一切，等等，等等，都是诸如此类的话。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不难想象，有些人虽然年过半百，却还是一个孩子，而我们这一位最最天真的老孩子，在他神经发作的时候，可能达到怎样歇斯底里的程度！我亲眼看过这些信中的一封。那是在他们之间的一次争吵之后，争吵的原因很琐屑，使用的语言却极狠毒。我吓坏了，求他别把信送出去。

“不行……这样更诚实一些……这是我的责任……如果不向她承认一切的一切，我就活不下去！”他回答说，那神情几乎像发烧似的，他终于把信送了出去。

这就是他们俩之间的差别，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绝对不会把这样的信发出去的。的确，他喜欢写信，可以说入了迷，即使与她同住在一座房子里，他仍写信给她，在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一天还写两封哩。^①我确确实实知道，她总是全神贯注地看这些信，哪怕是一天两封；而在看完之后，标上号，分好类，放入一只专门的小箱子里；此外还把它们记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她让她的朋友等候她的回信等上一整天，接

^① 有关格拉诺夫斯基的一部传记中写道：“1841年6月1日，格拉诺夫斯基告别未婚妻，分袂六周（……），在这几周里他每天给她写信，有时一天两封”“有时候他离家几小时也要给她写信……”——俄编注

着神情泰然地和他相见，好像上一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渐渐地她把他管教得规规矩矩，他自己也不敢提昨天的事，只悄悄地看一会儿她的眼睛，窥测她的心情。然而她什么也没有忘记，而他有时却忘记得太快了一点儿。他受她泰然自若的神情的鼓舞，往往当天就开怀大笑，如果有朋友来访，还会以香槟酒款待，像小学生似的嬉闹。这时刻她瞧着他的眼睛里一定充满了怨毒，而他却浑然不觉！只是在一星期之后，一个月之后，甚至半年之后，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他会在无意中想起这样的信中的一个词语，然后是全信以及当时的全部情景，他会突然羞愧得无地自容。他如此痛苦，常常引起一阵阵轻霍乱的发作。这种他所特有的阵发性疾病，类似轻霍乱，在某种情况下往往是他的神经受刺激的结果，也是他身体结构的一种有趣的奇特之处。

的确，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有时候确实很恨他；但是他自始至终没有注意到她的一件事，那就是对她来说，他已经成了她的儿子，她的创造，甚至可以说她的发明，成了她的骨肉。她留着他，供养他，完全不只因为她“妒忌他的才能”。这种想法一定会使她感到委屈！在不断的憎恨、妒忌和蔑视之中，她心头蕴藏着无可抑制的对他的爱。二十二年来她守护着他，使他不受一粒尘埃的污染，哄着他，如果涉及到他的诗人、学者、志士仁人的名誉的话，她会因担忧而彻夜不眠。他是她创造出来的，而她第一个对自己的创造物确信不疑。他好像是她的一个梦想……但是，因此她对他的要求的确很高，有时甚至要求他奴颜婢膝地服从。她爱记仇到了极点。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讲两件趣事。

四

有一次，还在关于解放农奴的消息刚传出来，俄罗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准备迎接复兴的时候^①，一位彼得堡的男爵途经我省，拜房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男爵在最高层社会里交游极广，而且很了解改革的内情。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十分重视这类访问，因为自从她丈夫去世之后，她与上层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最后完全断绝了。男爵在她那里坐了一小时，用了茶。座上没有其他任何人，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把他郑重介绍给客人。男爵甚至曾经听说过他，或者装作听说过他，但是在喝茶的时候很少跟他攀谈。当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会丢脸，他的仪态举止十分优雅。虽然他似乎不是出身名门，但是机缘凑巧，从孩提时开始，他就在莫斯科的一户贵族人家中接受教育，^②因此教养良好；法语说得同巴黎人一样。这样，男爵一眼就应该看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幽居外省，但她周围是些什么人。然而事情的结果却不是这样。当男爵证实当时开始流传的关于伟大改革的消息完全属实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乌拉！甚至做了一个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欣喜。他喊的声音并不高，甚至还很优雅；他的欣喜也是预先经

^① 关于政府意图解放农奴的最初传闻多次出现于 19 世纪 40 年代。

^② 格拉诺夫斯基十三岁时被送往莫斯科一所寄宿学校学习了两年。这所学校是莫斯科大学德国语言文学讲师、法学博士 Ф.И. 基斯特尔 (1772—1849) 开设的，除主人外还有莫斯科大学的其他一些教授和学者在校中授课。——俄编注